

書評：  
**Bill Readings《廢墟中的大學》論大學的理念及教學**  
**Book Review:**  
***The University in Ruins***

方永泉  
Fang, Yung-Chuan

Author's Correspondence Information

作者通訊

方永泉 **Fang, Yung-Chuan**

Professo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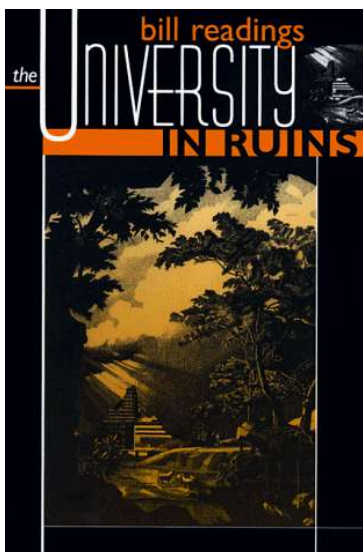
Department of Education

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

No.162, Sec. 1, Heping E. Rd., Da'an Dist., Taipei City 10610, Taiwan (R.O.C.)

## Bill Readings 《廢墟中的大學》 論大學的理念及教學\*



書名：The University in Ruins

作者：Bill Readings

出版社：Harvard University

出版日期：1997年

### 壹、前言

Bill Readings 為加拿大天才學者，惜英年早逝（1994 年空難辭世，得年僅 34 歲）。Readings 生前為蒙特婁大學比較文學副教授，其之所以對於現代社會的大學進行批判性論述，主因是出於對大學公司化的現象有所不滿。在其教育代表作《廢墟中的大學》（*The University in Ruins*）一書中，他發現當代社會中的大學正在成為一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機構，現代的大學不再擔負起民族文化理念的生產者及捍衛者的任務，而使得大學不再與整個民族國家命運緊密連結在一起。

「大學正在變成一個全然不同的機構，它不再是民族文化理念的生產者、保護者與傳播者，因而無法將自己與民族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。」

---

\* 本文初稿原發表於《通識在線》第 32、34 期，修訂稿於 2015 年 10 月在臺北市立大學「通識教育與教育哲學研討會」宣讀。

換言之，在現代社會中，大學性質不再是「文化的」，而是「商業的」，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，大學逐漸變成了「跨國性的科層體制公司」，更逐漸脫離了滋養其生成的社會文化脈絡。根據 Bill Readings 的觀察，他認為現今社會中的大學已走向科層化及資本主義的「企業機構」，而此一走向是與民族國家的衰微直接相關。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，民族國家不再是資本運作生產的唯一場所，在這種脈絡下，大學的使命必然會發生相應的變化。大學已從原先為民族國家「陶冶人才」的教育機構走向一個相對獨立的經營機構，在此同時，它自己也面臨市場競爭機制中的各種挑戰。大學愈來愈像企業體中的成員，無法再固守於學術的象牙塔之中。

Readings 以為，原先所謂的「現代大學」，亦即 Kant 所講的以「理性」為宗的大學乃至 Humboldt 意味的以承擔國家和民族文化使命為己任的大學已然步入了歷史，成為歷史的遺跡及廢墟。面對著大學使命及體質的劇烈轉變，深受後現代思想影響的 Readings 似乎並不打算完全隨波逐流，他不甘於今日這個「後歷史時代」中大學只能為企業經營及市場競爭而服務，但又不願再賦予其如現代大學所重視「理性」(reason)、「文化」(或譯作「陶冶」)(culture)的「後設敘述」(metanarrative)般之重大使命，於是他轉而從另一角度重新思考大學這個社群在今日社會中的角色。

筆者認為，Readings 正是透過對於現代大學使命的「解構」，重新「建構」了今日大學應有的新樣貌；然而其重新建構的方式，卻是要透過微觀角度的實際教學開始著手。大學教育的理念究竟是如何發生轉變的？大學該如何從廢墟中獲得重建？這正是 Readings 在《廢墟中的大學》一書中所論述的主題。

## 貳、大學理念的轉變——理性、陶冶到卓越

在《廢墟中大學》中的第四章到第六章中，Readings 針對了現代大學的基礎理念的演變進行了分析。Readings 認為，現代大學的核心在於「形成民族文化」，亦即希望將學生培養成公民主體和民族文化的承載者。惟這種核心在當今的社會中卻已發生了重大的轉變。

Readings 從歷史的角度分析，發現大學在發展過程中先後歷經三種理念：Kant 的「理性」(reason)、Humboldt 的「文化」(或「陶冶」)以及當代科層體制下的「卓越」(excellence)觀念。在 Kant 及 Schiller 的時代，理性統制著大學，後來經過德國觀念論的演繹，十九世紀初，Humboldt 將理性發展為文化(陶冶)的觀念，取代理性的是文化，文化也發揮了統一大學或是連結大學及政府間關係的功能。但

到了今天，大學早已將理性塵封，也放棄了社會文化使命，卻將卓越奉為圭臬。然而自 Readings 的角度來看時，所謂的「卓越」其實卻是一空洞的理念（empty idea）。

首先在「理性」觀念方面。Readings 以為「理性」是賦予大學以現代意義的最重要原因。在中世紀大學中，學科以「七藝」為主，而其統一原則是神學或神正論（theodicy），此時神學是以一種「外在監督」的形式而介入。而 Kant 指出，現代大學與中古大學不同的是其統一原理卻是「內在於」（immanent）大學中的，Kant 將這種內在原理稱之「理性」，理性的學科是「哲學」。雖然從七藝的角度看，哲學屬於較為基礎的前三藝，但它是自由的及理性的探究。哲學本身即具高度的「自律性」，它不需依靠外在的權威，僅憑藉「理性」及「理性實踐」即可，而其他的學科都需透過哲學之助，方得以探究自己本身的根基，透過「自我批判」，讓各學科的研究得以從「經驗性研究」進展到「理論性的自我知識」。哲學追求的是「批判的官能」（faculty of critique），它激勵了大學，使大學得以不同於技職學校（行會，gild），甚至也不同于專業性的學會（specialized academy）——如皇家學會（Royal Society）等。

從這個角度看，大學的自主性，奠立在理性因著自我批評所獲致的自律上，它排斥任何直接的社會影響，以及大學與國家（the state）間的關連。但是在 Kant 的文獻中卻又認為大學的功能之一即在為國家培養技術人才，也就是實務人才，這種大學的「社會使命」觀念似乎有些矛盾，而此點也被 Derrida 所注意到。Derrida 在其〈槓桿；或學院之爭〉（Mochlos; or, 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）<sup>1</sup> 一文即曾提到此項矛盾。同樣地，在有關國家與大學的關係方面，國家有時亦需介入，以提醒實務人員將其服務政府之知識運用的成果，提交大學中的學院（最終是哲學院）的控制之上。所以一方面，國家必須保護大學以確保公共生活是受到理性的節制，另一方面，哲學也必須保護大學，免於受到國家權力的迫害。「理性」的介入可說是區分「合理的爭執」（legitimate conflict）或「不和諧的和諧」（concordia discors）<sup>2</sup> 與「不合理的爭執」（illegitimate conflict）之間的最重要基礎。

惟當大學以「理性」作為其基本原理時，卻可能面臨到大學作為一種機構被「制度化」後，理性該如何與政治統合的問題。當理性的自律被「制度化」後，會不會反而導致它變成一種「他律」的性質？理性如何體現在大學中，但又同時不成為盲信的對象？哲學固然可以作到這些，但它首先必須從事自我批判的活動，然後透過批判，實現人性的本質。

<sup>1</sup> Mochlos 字源於希臘文，原意為「最好的槓桿」之意。

<sup>2</sup> 羅馬詩人 Horace，創造一個拉丁名詞：Concordia discors ——意即「不和諧的和諧」（Discordant harmony），此即為理性的基礎。

因此當大學是以理性為其原理時，實際上這種大學卻只能存在於虛構的想像，所謂 Kant 式的大學，若嚴格來說，它只是一個「想像的」(fictional) 制度，惟有當制度仍維持在想像的地位時，理性才能夠被確立，也惟有大學不真的是一種制度時，它才能真正發揮作用。如果大學真的被制度化，那就理性就會離去。

Readings 以為，要解決理性及制度兩難的問題，兩者間原先存在的「想像」關係終究必須落實；有時國家為了在大學中遂行其統治的合法性，甚至不惜與大學衝突甚或決裂。Readings 探究相關文獻後，比較了法、德、英等國不同的落實方式。他注意到法國傾向於關注「普遍人性」(humanity) 的概念，而德國思想則較關注「民族性」(ethnicity) 的問題。Readings 認為，之所以形成這種差別的原因，主要是由於法國在大革命之後，是訴諸民眾的力量來使政府合法化；至於德國則是在俾斯麥政府的前後，致力藉由民族團結 (ethnic unity) 獲得政府的合法性。而一旦大學中的理性被「國族文化」(national culture) 的觀念所取代，成為大學的動力原則後，大學就必須為國家及政府而服務。

是以，即便強調大學的功能在文化陶冶的同時，實則國家仍主導了大學的制度結構及社會構作，進而有效地掌控了教學及研究，而這也正是 Kant 倡議的「理性」大學之後，德國大學的特徵。相較於德國，法國由於其是經由普遍理性 (universal reason) 來賦予政府以「合法性」，因此其大學體系亦被定位於為「國族文化」服務，然而其還是保持從「迷信」與「啟蒙」間鬥爭的角度來思考大學的身分。

由於在西方大學的發展過程中，德國大學占據了關鍵地位。因此 Readings 花了不少篇幅來討論 19 世紀出現於德國大學的「陶冶」或「文化」的觀念。Readings 的分析是，藉由德國觀念論 (包括 Schiller、Schleiermacher、Schelling 及 Fichte) 在思想上的準備，最終在 Humboldt 所組建的大學中實現了「陶冶」的理念。例如 Kant 所關注的「制度化」問題，在 Schiller 手中被轉變成如何從「自然狀態 (國度)」(state of nature) 邁向「理性狀態 (國度)」(state of reason)，同時又不能破壞自然的問題。而 Schiller 的解決方案正是要透過「文化」(在 Schiller 的用法中，指一種美育的過程)。陶冶可使我們從自然走向理性，但卻不用破壞自然；藝術可以移除自然中偶然的因素 (允許道德)，同時又不會使理性完全脫離自然。因此，所謂的「教化」(Bildung) 雖是道德品格發展的過程，然而在其中，「美」卻是一個重要中介步驟；「美育」基本上是一種「歷史的」過程：透過歷史的過程，理性被賦予生機 (organic life)。在實現理性的過程中，國家 (政府) 必須取代教會，然而其間也需要一「中介機構」(intermediate institution)。此一中介機構必須能夠實現「陶冶」的過程，使人的自然性格得以為「理性國度」作好準備。

在 Schiller 之後，一些觀念論學者的看法——F. Schleiermacher、F. Schelling、J. G. Fichte 等人也都影響了「陶冶」觀念的出現，例如 Schleiermacher 將詮釋學

發展為一種「活化」(reworking)傳統(tradition)的方式,用以提升自然的工作至理性的層級,他認為擔負此工作中介機構就是「大學」。而 Schelling 則認為研究及教學在大學中是不可分割的,大學是教育體制的中心,它除了是「科學的守護所」(nurseries of science),也必須是「普遍陶冶的機構」(institution of general culture)。Fichte 則認為,現代實證性知識量的龐大,就愈使得個人的理解難以消化。他因此主張,個人必須尋求理解知識的本質性統一(essential unity),參與知識的有機整體。惟知識要能整合為一個統一的文化科學(a unified cultural science),必須透過「教化」,教化是品格的提升,藉著「教化」,民族國家將可以科學地達成古希臘人所擁有的文化統一(cultural unity)。

簡言之,陶冶的目的意在「達成文化統一」。不同的觀念論者間對於或有差異,或賦予不同的制度形式。例如 Schiller 主張「美育」,而後來的觀念論者則將 Schiller 「美」(beauty)的呼籲,進一步發展成「文化」的追求。對於觀念論者來說,「文化」兼具先驗性(transcendence)(用以指導純科學的統一,本身是思辨性思考或研究的基礎其對象)以及發展歷程(development process)(具有教育意義的教化)的意涵。就如同 Humboldt 所說的,文化的原理體現於大學之中,其中含有客觀的科學(文化知識, cultural knowledge)與主觀的精神道德訓練(培育, cultivation)在內。(pp.65-66)

Humboldt 所規劃的柏林大學計畫可說統合了前述的論述。對於國家而言,大學具有一種間接的或文化的(陶冶)功能:一方面大學應追尋客觀的文化意義(具備歷史永恆性);另方面大學則須對其成員進行主觀的道德訓練,因其為文化的準負載者。Humboldt 觀察到,哲學反思的自主性,必須免於漫無方向的休閒及純粹實用的兩端(完全受到政府的控制),知識不能夠完全不受其應用所影響,但也不能夠完全受其支配。知識的決定,必須與絕對知識中無所限定的理念(ideal)有關。我們理解大學的社會使命,並非從思想,也非從行動;大學不僅僅是一個提供沈思的場所,之後再將沈思所得轉化為行動;大學也不只是社會政策的工具。相反的,大學必須將思想體現為行動,將思想當成為理念的奮鬥。大學與國家必有連結,因為它們就像是硬幣的兩面,政府必須尋求將行動化為思想,也就是國家的理念,但政府必須保護大學,大學則守護國家的思想。兩者各自為實現民族文化的理念而奮鬥著。大學將文化(陶冶)當成其動力原理,這樣的觀念形塑了現代大學及其與民族國家的關係。這似乎是 Humboldt 較自由的計畫的勝利(相對於 Fichte 較保守的計畫)。的確, Humboldt 並未如 Fichte 將「同一性」(identity)等同於「秩序」(order)。雖然 Humboldt 對於理性的觀念較具思辨性及普遍性,而他的國家觀念也不像 Fichte 那樣具有民族性,然而,日後大學的發展所遵循的卻比較像是 Fichte 路線,特別是從民族的觀點(ethnic term)來界定培育(cultivation)的過程。

談完了德國之後，Readings 又轉至英國（英語系世界）大學的討論，他認為在英國的情形較特殊。因為英國長久以來並無公立大學的體系，故其有關於大學體制的思索（例如 Newman 與 Arnold）則一直要等到大英帝國開始形塑民族、國家及現代性時，此一需要才出現。另一方面，由於英國是以文學（而非哲學）作為闡揚國家認同的學科——此可能是由於英國是政教合一之故，事實上直到 1854 年之前，英國國教甚至對於牛津、劍橋大學都還擁有完全的控制權——這種政教合一的情形，使啟蒙所帶來的理性和教會間的衝突顯得不是那麼明顯。對英國人而言，是莎士比亞（而非希臘人）的作品，被視為能代表國族的純正文化，也是整個國家必須透過大學教育的理性思索所重新尋獲的文化。簡言之，在英國產生了國族文學（national literature）的觀念；國族文學的系所逐漸取代哲學系，而成為大學人文學科的中心，並成為大學中的精神堡壘。

在這三種不同的理性落實的方式中，Readings 明白表示，德國的大學經驗可說特別具有關鍵性。因為其所強調的「文化」觀念奠定了現代大學的基礎，「文化」觀念之所以出現是為了對抗分裂。十九世紀的德國，大學扮演了凝聚新起的德國民族國家的功能。透過大學，所謂的現代性結合了進步與統一，將現代革新中的破壞的那一面導向一種更高層的社會單位——也就是民族國家的層次。另一方面 Humboldt 對於 Schleiermacher 及 Fichte 之思想所進一步作出的回應，提供了柏林大學的制度模式，而此一制度模式又成為現代公立大學的一般模式。美國亦是在德國大學模式的基礎上，進而透過 Johns Hopkins 大學，將這種模式「科層化」，最後發展出追求「卓越」的觀念。

## 參、如何對抗「卓越」論述？——大學教學的「去中心化」

今日大學的重要特徵，就是現代意義的大學其原先所強調的「理性」及「陶冶」等概念被「卓越」（excellence）論述所取代。影響所及，大學教育的實際也受到了影響而發生重大的轉變。例如 Readings 就指出，當代的大學歷經前述理念的變遷後，大學校長的角色也隨之改變：（1）在 Kant 式強調理性的大學中，大學校長的工作是純學術的，他僅需在不同學院間的爭端中依據理性進行判斷即可；（2）以「文化」為主的大學，校長角色則須融入一種普遍陶冶（不獨某個學科）的導向，扮演大學中的重要人物（如十九世紀的大學校長 Charles Eliot 或 Benjamin Jowett）。大學校長的角色，除了「教化」之外，另一則是社會意義的「統合」；（3）在追求「卓越」的大學中，校長成為科層體制的行政人員，其角色則從「裁判者」、「統合者」到「執行者」及「經費募集者」，他不再公開表達任何意見或作出任何判斷。

為了要對抗「卓越」論述，Readings 認為今日必須採取不同形式的思考，他相信此一抗爭的源頭應該是發生在「教學場景」中。而要如何開始呢？Readings 認為，我們應該重新思考「教學的價值」之問題，他認為教學應該具有一種特定的「時空型式」(chronotope)，這種型式使得大學的教學與「卓越」論述中的「績效」(accounting) 觀念截然不同，其所產生的應該是教育中的「責任」(responsibility) 觀念，在 Readings 的心中，「責任」及相關的「承擔」(accountability)<sup>3</sup> 的觀念在教育中不可或缺，惟因其與「價值」有關故問題遠為複雜

Readings 認為，現代社會大學所強調的「卓越」其實僅是一個「空洞的」(empty) 理念，其使得大學成為一種行政管理的機構，包括所有教學的整體過程皆得透過評鑑過程來進行管理，甚至包括教學內容的管理在內，而為了便於進行管理，知識也被轉化為可被測量及管理的。因此，大學的教科書採取了一種新的形式，它變得更簡短，而且對學生的要求也更少，變得更朝向「虛擬化」(virtuality) 發展；教學也失去了本有的目標，它變成以「管理」學生為目標，是以行政者的角度來認可學生，透過資訊管理來「訓練」學生。Readings 別出心裁地察覺到，在追求卓越的大學中，教學並非無關緊要，但它的教學常與行政邏輯是緊密結合，故我們若想重思大學教學，所作的不是重新「將教學置於中心」，卻反而是要將「教學去中心化」。

教學的「去中心化」意味著在教學的過程中，不再由「最高主體」(sovereign subject) 的概念來支配著教學，「最高主體」意指教學的目標在強調人類自主 (autonomy) 或「主體」的養成。對於 Readings 而言，所謂的「去中心化」所注意的應該是「教學的語用學場景」(pragmatic scene of teaching)，亦即必須開始重視教學中的「對話」。Readings 以為，「後歷史大學」(post-historical university)<sup>4</sup> 應該致力於解消將「權威」與「自主性」結合在一起的看法，轉而將「教」與「學」的場景重新塑造為一種「責任的場域」(sites of obligation)、「倫理實踐的所在」(loci of ethical practices)，卻不再單只是將教學視作科學知識的傳遞工具。

而作為一種責任的場域，教學要回答的問題也不應再只限於真理標準的問題，卻應著重「正義的問題」(question of justice)；其所關注的不再只是知識傳遞或是個別主體解放的問題，其應該超出個別的正義意識之外，轉向對其他人的責任及關注。

<sup>3</sup> 在 Readings 的用法中，accounting 與 accountability 是應該區分的兩個概念。前者較偏向會計式思考，凡事講求量化的評估，強調績效的計算。後者在 Readings 用法中，較帶有道德及倫理的意涵，是以將其譯為「承擔」。

<sup>4</sup> 「後歷史大學」在 Readings 用法中所指的即是現代社會中以追求卓越為主的大學。



Readings 的重視對話的「教學場景」的特色，它包括了下列兩點：(1) 教學應該是一種基進的 (radical) 對話形式，這種對話形式與 J. Habermas 所講的「溝通理性」有所不同，它最後不會到達某個單一結論，也未必會達成意見的綜合，更不會單單地受到傳達者一方的控制；(2) 至於在接收者方面，Readings 傾向於接受 Bakhtin 所講的對話性 (dialogism) 主張，認為無論傳達者或接收者的腦中都是充滿著語言的，因此溝通傳遞的內容並不能充分描述語言溝通中所發生的一切事情，溝通不可能是預先構作好的意義之移轉。

## 肆、重新理解教學——以「思想」之名的責任網路

Readings 提出了他自己對於教學的理解——他認為教學是一個「無止盡」的過程，而其所指涉的內涵則應該是「思想」(Thought)。他強調教學應是一種關係 (relation)，一種責任網路 (network of obligation)，而教師的角色也應該是「修辭者」(rhetor)，而非「師傅」(magister)，兩者的區別是，修辭者總是在一個修辭環境下進行言說，其論述不是自我權斷的 (self-authorizing) 的，修辭者是一個演說者，能顧及到聽眾，但師傅卻是不會慮及聽眾之特殊性的。Readings 以為，教師的教學要旨並不在「說服」學生，也不在與學生間建立「打成一片」的良好關係，卻在於建立能夠喚起「倫理責任」的責任網路，而這樣的責任網路又有下列的特點：

一、大學的教學內容應是以「思想」為名的教學。「思想」之名固是空洞的，但是至少它並未因此獨霸了進一步討論的權力，不願意進一步思索「價值」的問題。為此，Readings 主張，以「思想」的「虛名」(empty name) 來取代「卓越」的空洞理念 (empty idea)。

二、以「思想」為名，除了代表一種學術上的誠實外，還必須了解，「思想」的功能不是「回答」，而是「質疑」或「發問」(question)。「思想」之名，完全無涉於真理，因而使我們更無顧忌地發問，也可讓我們持續保持警戒的態度，不致僵化於某種理念之上。

三、在教學的過程中，「思想」可謂講者與聽者之間的第三項 (third term)，它代表一種「歧義」與「爭端」，作為一個名字，思想是不能流通的，它所等待的，只是我們對它的回應 (response)。教學中要引發的是與思想之名有關的「歧異」及「問難」，它代表了一種「超越」，但不是被膜拜的，也不是被相信的，而是要將所有參與的人擲入至一種「失根的」反省之中。

四、教學場景是屬於「正義的領域」而不是「真理」的領域。我們無法從知識論的角度來賦予「思想」真理，而只能透過政治性的行動來提供「思想」意義。教學場景的結構屬於一種「不對稱關係的語用學」，其中教師對於學生的責任及學生對教師的責任是不對稱的，在這點上，無論師生都必須具備「倫理的覺察」來了解。

五、在教學的實踐中，我們必須先「對於他者有著一種無止盡的關注」，惟其所關注不是關心「個別主體」，而是對於某個「絕對他者」(an absolute others)的「尊重」，基於這樣的尊重，沒有任何理由，我們就是必須去聆聽，不斷地保持「對於他者的覺察」。Readings 強調，大學中的「他者」不只有學生或是所謂過往偉大的思想傳統，課堂中仍有其他的「他者」存在：包括：文化、思想、欲望、精力、傳統、事件、故舊或崇高之物等。Readings 指出，以往教育制度的重點就在篩選與疏通「他者」，以減緩其帶來的問題，但真正的教學卻應該是「對於他者的注意」

## 伍、結語

Readings 在《廢墟中的大學》對於現代大學初興之時的「理性」基礎理念及其後的發展演變，可謂有深入的理解及獨到的解讀。比較他在該書中後來所提出的大學作為一種「各執己見的共同體」，強調「以思想之名」(in the name of thought)辦學的理念，主張面對全球化脈絡時，大學教育應培養學生的反思、質疑、批判的能力，這樣的大學觀，雖然主要是受到後現代思想的影響，但從他對於現代大學中 Kant 式大學有關「理性」的解讀中，亦可見出其端倪及淵源。

簡單地說，Kant 式的大學就是理性的大學，就是「批判的場所」，這種批判的態度及能力一直是大學的基本理念及精神所在，即便到了後現代及後歷史的大學中，它也仍然能夠帶動思想活化，使得我們能夠脫離「追求卓越」的空洞口號，達到思想交流及創造的真正理想。

另一方面，從前述 Readings 對於大學教學的分析，可以了解到，他已發現到今日大學面臨的問題，在於大學作為一種體制，資本主義的科層制度早已深深地涉入了大學的體制中。這樣的大學甚至可以將彼此間對立的知識整合入體制之中，讓知識得以流通，而其所使用的方式，正是以「卓越」此一空洞的理念作為號召（有時也是鞭策的驅力）。在此情形下，即便是深具反抗精神的「基進主義」(radicalism)也被吸納入大學的知識體制中，成為具備市場性格，並能夠進行大量生產、交換

與消費之循環的知識，而整個大學體制也就在這種知識資本的不斷累積中攫取利益。

而 Readings 提供我們的思索及解決方向，就是要讓大學的教學「去中心化」，要讓大學的教學能夠有其特有的「時間性」來對抗商業化的壓力。簡單地說，他希望大學能夠成為一個以「去中心」為「中心」、「去共識」為其「共識」的各執己見之「學術社群」。而要往這樣的方向發展，以「聆聽思想」(listening to thought)來取代目前大學一頭熱的「追求卓越」，此種說法可謂深具啟發：「聆聽思想」的目的，不是為了培養「自主主體」或是發展一套自主的知識體系，而是要和每個「他者」一同進行思考，探索並建立一個更有開放性的責任網絡。

最後，從筆者的角度來看，Readings 以「思想」之名來取代「卓越」的理念，對當前國內大學一味「追求卓越卻不知為何要追求卓越」的熱潮，可說有其深刻及發人深省之處。身為人文科系的教授，Readings 對於知識及真理的看法，固可能與自然及社會科學學者對於知識及真理的看法有極大的差距，而未必均需予以認同，不過他主張對大學的重建，要從具體而微的「教學場景」開始實踐起，也應仍是所有大學教育工作者都不能予以否認的教育價值。

## 參考文獻 References

- 蔣凱：〈大學認同危機的人文反思——評比爾·雷丁斯的《廢墟中的大學》〉，《北京大學教育評論》，第7卷，第2期，2009.7，頁170-79。
- Readings, B.：《廢墟中的大學》，郭軍、陳毅平等譯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8。
- . *The University in Ruins*. Cambridge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97.